

亚里士多德论模态词与悲剧情节的一体性^{*}

董 波

摘 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情节的一体性需要通过遵循“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来实现。但将这些模态词用于约束悲剧诗人的创作,却带来了诸多疑问。通过考察模态词的哲学含义可以发现,“可能性”比“必然性”更适于描述悲剧所模仿的人类行动。根据亚里士多德对《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一剧情节的重述,一方面,可能性原则要求悲剧情节呈现出人类生活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彰显诗的哲学性价值;另一方面,以人物性情为基础的行动选择又揭示了悲剧情节内在的道德哲学意涵。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必然性;可能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

DOI:10.11714/jssu.sse.202605014

亚里士多德对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深感兴趣,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包括必然性、可能性等模态概念的系统理论,将其有效应用于逻辑学、物理学及形而上学等领域有关三段论推理、运动的因果关系、事物的本质与属性诸问题的讨论中。但出人意料的是,亚里士多德也将必然性与可能性这样的模态词用于他的诗学理论建构,并就此确立了约束悲剧诗人创作的基本原则。模态词与诗学的奇特结合带来了多方面的困惑:这些模态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将其用于规范悲剧情节的旨意何在?这一要求又反映出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何种重要特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定义为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而由行动构成的事件组合就形成了悲剧最核心的要素:情节。但情节不应是缺乏关联的若干行动的拼凑,相反,它必须呈现为一个完整而一体的行动。为此,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的开头、中段和结尾要体现出自然的关联和情节的一体性:

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一体的,且具有一定量度的行动(πράξεως)的模仿……具有开头、中段和结尾才是一体。开头是其本身并不出于必然(ἐξ ἀνάγκης)在他者之后,而在它之后则有他者出于自然(πέφυκεν)而存在或生成。反之,结尾是其本身出于自然在他者之后,或是出于必然,或是多数情况下如此(ὡς ἐπὶ τὸ πολὺ),但其后再无他者。中段则其自身在他者之后,且其后又有他者。因此,组合得好的情节不应当偶然地(ἔτυχεν)于某处开端,偶然地于某处终结。(1450b25-34)^①

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强调,无论表现悲剧人物从厄运转入好运还是从好运转入厄运,悲剧情节必须依照“可能性或必然性”(κατὰ τὸ εἰκὸς ἢ τὸ ἀναγκαῖον)的原则(1451a13-15)。对悲剧情节的这一要求在两个方面不同寻常: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两次强调了各部分之间关联关系的自然性(πέφυκεν)特征。为此,他实际上以自然物类比悲剧情节的一体性:悲剧的各部分就像动物的头部、身子和尾部那样自然地结合为一体。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先后采用了多个模态词来约束悲剧的情节结构:“必然”“多数情况

* 收稿日期:2026—04—18

作者简介:董 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广州 510275)。

① 本文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引用标注贝克编码,译文由作者根据希腊文原文自译。其中,亚里士多德《诗学》原文参考 R. Kassel, *Aristotle de Arte Poetica*, Oxford: Clarendon, 1965; 中译本参考陈中梅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和陈明珠译本(《诗学》译笺与通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除特别注明外,编码皆指《诗学》。

下”“偶然”和“可能性”。对情节一体性的要求为何如此依赖于模态描述？又当如何理解悲剧情节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原则？

一、从必然性到可能性

必然性是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他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四种必然性：第一，“为了生存或善的目的”的假设必然性；第二，违背选择或理性的“强力”或“强迫”；第三，“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总是如此”的无条件必然性；第四，推理证明中的绝对必然性。亚里士多德补充说，“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是必然性的核心含义，其他含义的必然性则由这种必然性衍生而来（《形而上学》1015a20-b16）^①。无条件的必然性既不受外力强迫也不违背自然，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中得到完全实现，如天体运动中所体现的必然性。除此之外，这种必然性还被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必然是两足动物）。

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情节遵循的必然性属于上述四种必然性中的哪一种？事实上，在解释第二种也即外力强迫造成的必然性时，亚里士多德正是以悲剧为例：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埃勒克特拉悲叹：“强力（βία）让我必然（ἀναγκάζει）这么做！”（《形而上学》1015a31）^②但强力的必然性并非悲剧情节的必然性。外力、运气和神的干预等固然是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重要元素，但亚里士多德恰恰要求将这样的元素置于戏剧之外，以保证情节本身的一体性，如此才符合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1454b1-8）。所以，悲剧情节的必然性并非外力强迫意义上的必然性。此外，尽管这一原则要求悲剧所描绘的事件之间不能仅仅呈现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必须存在因果关系（1452a20-22），但这种行动上的逻辑关联显然并非第四种也即三段论推理中从命题推出结论的那种必然性。

在余下的两个选项中，第一种“假设必然性”与第三种“无条件必然性”哪个更符合《诗学》对悲剧情节的规定？对这一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回答。贝尔菲奥里（E. Belfiore）将《诗学》中的必然性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假设必然性：一方面体现为以生存为目的的必要行动，如饮食、睡眠和繁衍等生物性的自然需求；另一方面也包括为了生活之善而必须从事的活动，如城邦中的公共政治活动，因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自然地是政治生活的动物^③。假设必然性意味着，如果没有某一行动，善（τὸ ἀγαθόν）就无法产生。例如，为了不生病，吃药就是必然的；为了获取财富，去埃及的航行就是必然的（《形而上学》1015a23-26）。假设必然性确立了人的行动与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言，任何行动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而人所追求的最高善就是幸福。为了实现幸福，在由一系列行动所构成的手段—目的链条中，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某一行动，这就是行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也构成了实现善之目的假设必然性。

弗雷德（D. Frede）则反驳了这一观点，她断言亚里士多德从未在任何地方把必然性解释为实现既定目的的手段；相反，《诗学》中悲剧情节的必然性应当被理解为“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的无条件必然性^④。但是，无条件必然性要求总是（ἀεὶ）如此而不能是另外的样子，所以它并不真正适合描述人类生活的世界。首先，月下世界的自然实体与永恒的天体不同，它们经历着生成与毁灭的变化，而偶然因素可能阻碍其自然目的的实现，难以达到无条件的必然性。其次，在有关人类行动的领域中，必然性不可能

① 证明的必然性也属于“不能是另外的样子”的必然性，此处为了区分其在逻辑学和其他领域的用法单独分类。参见D. Frede, “Necessity, Chance and ‘W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in A. O. Rorty ed., *Essays on Aristotle's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9.

② 引文来自索福克勒斯悲剧《埃勒克特拉》第256行。

③ E. Belfiore, *Tragic Pleasures: Aristotle on Plot and Emo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17-118.

④ D. Frede, “Necessity, Chance and ‘W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p. 199.

是绝对的、总是如此的。亚里士多德曾以“明天将有一场海战”这一命题为例反驳某种有关人类生活的宿命论主张,即一切将发生的事件都必然发生。海战在明天发生或不发生,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必然的;但这场海战“将要”发生或不发生则并非必然,否则人就没必要慎思(βουλευέσθαι)或采取行动,以为如果我们做这件事,这事就会发生,如果不做则不会发生(《解释篇》18b25-33)。亚里士多德断言,未来之事的起点来自慎思和行动,并非永远处于现实状态的事物既可能(δυνατό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解释篇》19a7-13)。只要人对自身的行动有所选择,它就不会呈现为“不能是另外样子”的必然性。因为行动的起点是选择,而选择来自人的慎思和欲求(《尼各马可伦理学》1139a31-33)。

这一反驳揭示了人类行动的特殊性:行动者的选择会影响事件是否发生。亚里士多德论证,“必然”蕴含着“可能”,任何必然的事物都是可能的;但反过来,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如此、总是如此,而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解释篇》22b11-14)。由于人类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总是如此,反而会出现另外的样子,因此,可能性是比必然性更适合描述人类行动的模式词。

在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一般使用 δυνατόν 一词表达可能性的模式;但在《诗学》中,他更习惯使用 εἰκός。εἰκός 作为一个日常用语,可以表示好像、可能的、合理的等意义。实际上,除了《诗学》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几乎从未把 εἰκός 当作一个严格的术语来使用。也只有在《诗学》中,εἰκός 与 ἀναγκαῖον (必然性)两个模式词才搭配在一起使用,构成了悲剧情节结构的基本准则^①。

《诗学》中首先与“必然”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常用模式术语是“多数情况下”(ὡς ἐπὶ τὸ πολὺ)。在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中,这两个词往往同时出现,前者表示总是如此,后者表示通常如此^②。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的判断与探究所涉及的大多数事物都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因为人们思虑和探究的是他们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几乎没有一样是必然的,从中推理出的也只能是多数情况下如此或可能的(《修辞学》1357a22-29)。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明确断言,“可能性”的意思就是“多数情况下”:可能的事情并非“总是”发生的事情,而是多数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修辞学》1402b21)^③。所以在《诗学》第7章中,“多数情况下”出现一次之后,亚里士多德随即用“可能性”一词替代了该术语,其在《诗学》中再未出现。

二、悲剧情节的可能性与一体性

无论必然如此、可能如此还是多数情况下如此,与这样的模式相对立的是偶然。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既非必然亦非多数情况下发生之事,可称之为偶然(《形而上学》1025a19-20、1026b24-37,《后分析篇》87b19-27)。按照他的阐述,如果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并非出于其预期的目的,比如去市场买东西的人碰巧遇到了自己的债务人而意外收回了一笔钱,或者有人挖坑栽种植物的时候发现了财宝,就是事出偶然(《形而上学》1025a14-21)。

为悲剧情节设定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其目的也是要排除偶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偶然性是诗与历史之间的分界线。因为“[情节的]构合不同于历史,历史必须要制作的不是对一个行动的解释,而是某一时期内、发生在一人或多人身上的任何事情,每件事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偶然(ἔτυχεν)”(1459a22-24)。偶然事件即使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也并没有在彼此间构成行动与目的关系,而只是不同的因果链意外重叠的结果。如果两个行动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像去市场与收回债款一样,它们彼此间的关联就是出于偶然。

① D. Frede, “Necessity, Chance and ‘W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pp. 206-207.

② 如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129a6-13中称,人与马的必然差异在于人总是两足动物。多数情况下,理性支配欲望和血气,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邪恶者的灵魂中欲望和血气支配了理性。

③ 亚里士多德将 εἰκός 与 ὡς ἐπὶ τὸ πολὺ 等同使用的用例还可见《前分析篇》70a5 和《修辞学》1357a34、1402b16、1403a1。

人类生活中恰恰充满了缺乏因果关联的巧合事件,因而真实生活被偶然性打断为离散事件的总和,无法以一体性的方式呈现出完全符合可能性或必然性的行动结构。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不能像历史一样仅仅并置式地记述这些事件,而是要超越离散的具体事物,根据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描绘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换言之,情节所模仿的行动之间必须存在由可能性或必然性构合在一起的因果关联,从而一方面把握人类行动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把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因此,诗比历史更哲学(1451b6-10)。

运气(τύχη)是希腊文化中对偶然性的一般理解。运气观念从传统宗教和神话进入悲剧情节之中,构成了影响人物命运的重要因素。但亚里士多德断言,这在悲剧情节中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偶然性是不可理解的,它代表着悲剧中的非理性成分^①。因此,他要求诗人尽量避开这样的非理性要素,或者将其置于戏剧之外。一旦排除了运气和偶然,悲剧人物的行动就呈现出动机、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明确关联,就构成了符合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情节一体性。悲剧的情节也只有在确立了模仿的可理解性之后,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所期待的诗的哲学性^②。

由存在因果关联的事件构合而成的悲剧情节具备组织性(σύστασις),就像自然物那样,具有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和功能而结合起来的可理解的结构^③。实际上,可能性与必然性都与自然概念密切关联在一起^④。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在由必然性所导致的人类行动中,某些来自强迫,某些源于自然(《修辞学》1368b32-36),而出于自然发生的事情要么总是发生,要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修辞学》1369a35-b2)。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情节中的开头、中段与结尾应当像自然物一样将其各部分结为一体,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是出于必然,或是多数情况下如此。

亚里士多德将不具备自然一体性的情节称为“插曲式的”(ἐπεισοδιώδης)^⑤,它的特征就是缺乏依据必然性或可能性的组织结构(1451b33-35),事件之间的关联是松散的、偶然的。“这些事情应该源于情节本身的编排,这样它们就会由于前面发生的事情,通过必然性或或然性而产生。它们是因为某事而发生,还是仅仅在某事之后发生,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1452a18-21)。如果悲剧情节由这样缺乏因果关联而彼此不连贯的事件拼合在一起,违背了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原则,就无法实现悲剧情节之间的自然一体性。

但情节的可能性还包含着进一步的疑问:可能性的要求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呈现,还是代表着人们认知中的主观合理性?毕竟 εἰκός 一词在日常使用中可以表达这两方面的含义。作为对人的行动的模仿,悲剧创作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所编制的情节与被模仿的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模仿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当观众目睹舞台上的人物行动时,发现了情节与现实生活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种认知给观众带来了某种快乐,即便悲剧情节本身是令人痛苦的。当可能性被等同于多数情况下如此时,它的确表达了对事件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的判断,因此当然构成了对现实事件的客观描述。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模仿的素材之所以较多采用过去的已知人物,只不过是人们相信过去的事情

① 参见 D. Frede, "Necessity, Chance and 'W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p. 204。弗雷德认为,《诗学》排除了那些随机发生且无内在原因的事件,因为对于这类事件我们不具备知识,也无法从中学到什么。

② 参见 S. Halliwell,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Duckworth, 1987, p. 106。

③ E. Belfiore, *Tragic Pleasures: Aristotle on Plot and Emotion*, p. 113。

④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人的自然属性,如头发变白、生长或衰老,并非始终必然发生,因为人不会永远生存。但如果假设一个人的确生存着,这些情况要么必然发生,要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发生(《前分析篇》32b5-10)。这既是以生存为目的的假设必然性,也是源于人的自然的必然性。

⑤ 亚里士多德《诗学》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ἐπεισόδιον 及其衍生词:其一是指戏剧中合唱歌之间的部分,即第12章所说的“场”,其内容必然包含了主要情节;其二是戏剧或史诗中不属于主要情节的扩展内容,即插曲。哈利维尔(S. Halliwell)批评亚里士多德对于情节与插曲的区分过于粗疏,难以令人信服。参见 S. Halliwell,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48。

是可能的。实际上,只要符合可能性的原则,诗人完全可以采用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客观意义上的可能性并不是要求对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模仿,那将是历史,而不是诗。可能性原则的约束意味着,虚构不能天马行空,被模仿的事件之间必须具备确定的因果联系。

因此,将 εἰκός 限制于对客观现实的呈现会窄化亚里士多德期待它在规范情节结构时的意义。εἰκός 一词可以被理解为“合理的”“可信的”,即便并非与现实客观相符^①。在讨论史诗时,亚里士多德鼓励诗人制造惊奇之感,他作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更应当选择不可能(ἀδύνατα)发生但却可信的事(εἰκότα),而不是可能(δυνατὰ)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ἀπίθανα):构制情节不应来自不合理的(ἁλόγων)部分。”(1460a27-28)这一细密且拗口的表达像是在说,客观上不可能(ἀδύνατα)但在主观上可信(εἰκότα)的事件更可取,因为后者令人感到合理。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对 εἰκός 的使用更强调其主观可信性,因为修辞术的目的就在于说服听众接受自己的论证。诗人当然也需要以一种能够让观众信服的方式来组织情节结构,就像演说家的修辞一样,让听众感受到论辩合乎情理^②。但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可信性两个方面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互补的^③。在特定情况下,某些违背一般可能性的事件可以显得具有可能性。这正是修辞术的策略:让不可能之事显得可能。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诗学原则与修辞术完全等同起来。他要求悲剧中应当尽可能去除那些不合理(ἄλογος)之事,如果无法避免,也要放在故事情节之外(1460a28-30)^④。悲剧的情节结构不能完全建立在可信但不可能的事件基础上,否则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就会十分薄弱,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原则也会显得无关紧要。

三、性情与行动之间的可能性

可能性或必然性原则要求悲剧对人类行动的模仿超越现实生活的离散性和偶然性,呈现出认知上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这一要求的目的是否仅仅在于强调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亚里士多德断言诗比历史更哲学的依据之一在于,诗不像历史那样聚焦于个别人的个别行动,而是讲述“根据可能性或必然性,某一类人会说或会做的某一类事”(1451b8-9)。什么是某一类人会做的某一类事?它们与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又有什么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15章提出了对悲剧的性情刻画的要求:“对于性情(ἡθεςιν),应当就像事件的构合一样,始终寻求必然性或可能性,以至于这样的人必然或可能地说或做这样的行动(πράττειν),并且必然或可能地一事跟随一事。”(1454a33-36)在这句话中,可能性或必然性原则被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三次:首先明确了对性情的刻画也要符合这一原则,其次强调性情(这样的人)与行动(说或做)之间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关系,最后将这一原则落实在情节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之中。

亚里士多德断言:悲剧并非对人的模仿,而是对行动和生活的模仿,因为幸福与不幸在于行动(1450a15-18)。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以某种善为目的的人类行动,其所追求的最高善就是幸福。

① 关于对 εἰκός 主观和客观两种用法,参《修辞学》1402b15:有关可能性的论证被分为“通常是”和“以为是”两种情况。

② 参见 N. O'Sullivan, "Aristotle on Dramatic Probability", 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1995, pp. 51-52。奥沙利文坚持认为,当亚里士多德断言虽不可能但却合理之事更可取时,εἰκός 就已经被赋予了明确的主观上合理的意义。并且,悲剧的目的就是要引发对观众情感的净化,这就如同修辞术以说服听众为宗旨,它们都诉诸于主观的认知。

③ 参见 S. Halliwell, *Aristotle's Poetics*, London: Duckworth, 1986, p. 103。哈利维尔认为,εἰκός 的主观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对客观层面的反映:如果关注听众是否能够被说服,可能性的主观意义更为合适;如果关注的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可能性的客观意义则占主导地位。

④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史诗比悲剧更能容纳不合理之事。比如《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追击赫克托尔,而希腊将士却无动于衷地旁观。这在史诗中令人惊奇,但在悲剧舞台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就令人感到荒谬(1460a12-18)。

但幸福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存在于行动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作为行动事件的组合比性情更重要,悲剧的目的是情节对于行动的模仿,而不是为了模仿性情。行动比性情更重要是因为性情必须通过行动实现出来。但一个人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行动,是因为他是一个如此这般的人,即他具有特定的性情。这就是性情与行动的内在关联,因此,悲剧对行动的模仿也要把性情包括在内。虽然有观点否认悲剧所模仿的行动与人的道德行动之间的关联^①,也有学者强调情节的可能性原则完全聚焦于行动与性情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②,但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可能性或必然性要求既包含了对事件因果关联的约束,也包含了对性情和行动之间关系的陈述,而后者必然关系到对人物行动的道德评价。

那么,性情与行动之间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果一个行动是自愿的,它的起点存在于行动者自身之中,那么他可以选择这样行动,也可以选择不这样行动,因此这一行动就不可能是必然的。但是在特定情境中,在外部条件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如果他是具备某种特定性情的人,会否必然采取某种行动?比如正义者必然选择正义的行动,而放纵者必然选择放纵的行动?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的阐述,性情(ἡθος)是一个人的欲望和情感状态。他首先区分了性情与行动:一个做出有德性的行动的人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在性情上有德性的人,除非行动者具备三个条件,即知情、出于选择和出于稳定性情。性情的稳定性来自长期的习惯养成,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可能游移不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习惯一旦养成,就几乎构成了人的第二自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情意味着他形成了一种有关行动选择的特定心理机制,这也决定了他是否能够依据正确的理性来行动,从而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人的性情通过他在行动中的选择而得以彰显,而所谓选择,是行动者的欲求所设定的目的与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慎思的结合。“言辞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选择(προαίρεσις),无论何种,就是有性情。”(1454a17-19)他的性情为自己设定了欲求中的目的,构成了稳定的动机,从而做出某个确定的行动。比如,一个有德性的人必然不会有邪恶的欲望并做出不正义的行动。因此,具备稳定性情的人不会喜怒无常地行事,而是基于自己养成的情感好恶来应对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干扰,一个具备什么样性情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强调稳定的性情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密切关联,以至于被解读为某种“心理决定论”^③。当然,如前所述,这仍然不是那种“不能是另外样子”的必然性。首先,在行动者未能养成稳定的性情之前,其行动仍然存在着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其次,性情上的不自制者在其灵魂中存在着理性与欲望的反复冲突,因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不自制也恰恰是悲剧所描绘的典型人物特征。再次,具备稳定性情的行动者的最终行动仍会受到环境中偶然要素的影响,因而特定的性情可能会输出不同的行动,甚至一个放纵的人也有可能偶然做出节制的行动,虽然这并不等于他就是一个节制的人。因此,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要求性情与行动之间也应当具备可能性和必然性时,是指多数情况下的模态,或者自然发生的事情,而非总是如此的必然性。

① 如侯赛因(M. Husain)认为,“伦理行动和悲剧行动不仅不同,并且不兼容”。M. Husain, *Ontology and the Art of Tragedy: An Approach to Aristotle's Poetics*, Albany NY: SUNY, 2002, p. 87.

② 施密特(A. Schmitt)在他的亚里士多德《诗学》注疏中断言,古希腊悲剧中存在着大量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因果链完全不符的情节结构。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能性,并不涉及诗歌中所描绘的事件本身,而是有关性情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见A. Schmitt, *Aristoteles: Poeti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p. 310。希思(M. Heath)则认为侯赛因和施密特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因为前者割裂了诗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后者则把悲剧中模仿的行动当作道德行动本身,从而过度强调行动的性情基础。见M. Heath, “Reading the Poetics in context”, in P. Destree, M. Heath, D. L. Munteanu eds., *The Poetics in its Aristotelian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230。

③ 参见D. Frede, “Necessity, Chance and ‘What Happens for the Most Part’”, pp. 203-204。在弗雷德看来,这种“心理决定论”意味着,如果没有偶然事件的干扰并且具备足够的知识,一个行为者的行动就像自然事件一样是可预测的。

一个真正具备能动性的行动是出于行动者自身的,其行动选择反映着行动者自身的性情。性情与行动之间的确定关系意味着,诗人仅仅使事件之间符合因果关联是不够的,只有同时描绘了悲剧人物的动机源于何种性情而这种性情又促使其做出何种行动选择时,诗人才算是展现了“某一类人会做某一类事”,悲剧情节才真正符合可能性原则。

四、《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情节的一体性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以下简称《伊》)描绘了身处异乡陶里克的伊菲革涅亚遇到了久无音讯的弟弟奥瑞斯忒斯,在即将献祭弟弟之际姐弟相认,最后定下计谋共同逃离了陶里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先后六次明确提到这部剧^①,对他而言,该剧和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一样,是最优秀悲剧的典范^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与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悲剧情节的可能性原则紧密相关。在“可能性”(εἰκός)一词单独出现的八次用例中,有四次直接用于对该剧的讨论。不仅如此,该剧还是亚里士多德唯一对其情节加以重述的悲剧。就此而言,《伊》成了阐释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可能性原则的范例。下文将探讨该剧在何种意义上符合悲剧情节的可能性原则:首先,该剧情节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何在?其次,该剧中所涉及的可能性原则是否如前所述那样具备道德哲学意义?下面据此将亚里士多德对该剧情节的概述划分为开头、中段和结尾三个部分,并考察事件之间是否果真存在明确的因果关联。

开头:一个少女被献祭但又消失了,献祭者们不清楚为什么。她被安置到另一个国度,那里有以异乡人向女神献祭的习俗,她担任了祭司之职。一段时间后,女祭司的弟弟碰巧(συνέβη)来到这儿(神出于某个原因指定他去那里,这在普遍性(καθόλου)之外,以及为了什么去那儿,也在情节之外)。(1455b2-9)

该剧真正的开头是“弟弟来到此地”这一行动。因为开头意味着与之前的事件并未构成必然性的关联,否则应当以之前的事件为开头。亚里士多德以三个连续的限定强调了这一点:偶然、在普遍性之外和在情节之外。首先,弟弟的到来纯属偶然(συνέβη),就像去市场买东西却意外收回欠款一样。其次,他并不知道姐姐的下落而来此相认,因此,其行动的目的与最终的结果不一致。也就是说,弟弟到来的前因或目的并不符合可能性的原则,这恰恰是弟弟到来这一行动本身构成本剧情节之开头的原因^③。再次,这一行动自然地引发了之后的情节,构成了后续事件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他的到来,被俘、相认这些剧情都无从谈起。

神谕和神的命令是古希腊悲剧中常见的推动情节的重要因素,但在此处,亚里士多德却称其“在普遍性之外”。也就是说,神意只不过是行动的特殊原因:弟弟也有可能并未身负神意,比如遭遇海难而碰巧到此。同样,神指定他前来的具体目的是偷取神像,这对于弟弟的行动而言也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就其与剧情走向的关系而言也是偶然的。它们与后续情节没有形成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关联。

中段:他一到那里就被抓了起来,在将要被献祭之际身份被发现(这可以像欧里庇得斯那样,也可以像珀鲁伊多斯那样制作,根据可能性,他说不仅他姐姐,而且他自己也要被献祭)。(1455b9-12)

情节的中段包括了本剧的三个核心事件:弟弟被抓,即将被姐姐杀死献祭,姐弟相认。这三个事件的关系不仅仅是前后相继,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联,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情节可能性原则。首先,弟弟来到对异乡人充满敌意的陶里克,他的被捕就构成了开头中弟弟到来的自然后果;其次,由于开

① 分别见《诗学》第11章1452b3-8,第14章1454a4-7,第16章1454b30-36、1455a6-8、1455a16-19和第17章1455b3-15。

② 原因之一在于这两部悲剧的情节都包含了突转(peripeteia)和发现(anagnōrisis)的同时发生。

③ E. Belfiore, *Tragic Pleasures: Aristotle on Plot and Emotion*, p. 123.

头交待了姐姐作为祭司需要主持献祭异乡人的仪式,姐弟相残即将成为可能;最后,姐弟相认是本剧的高潮,体现为发现和突转的同时发生。根据上文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判断,欧里庇得斯笔下所描绘的姐姐身份的披露方式符合可能性原则。这一断语进一步说明,可能性并非必然如此、只能如此而不能是另外的样子,它实现的方式不止一种。欧里庇得斯让姐姐送信回家而造成相认的情节是可能的,而智者珀鲁伊多斯采取的方式也是可能的:他让奥瑞斯特斯推断,我姐姐是被杀了献祭的,现在轮到我了,这一表达也可以带来姐弟相认。

结尾:于是(ἐντεῦθεν)得救。这之后,就要安上名字,加入插曲。插曲要务求适宜(οἰκεῖα)^①,例如就奥瑞斯特斯而言,他由发疯而被抓,由净化而得救。(1455b12-15)

亚里士多德概述中的结尾实际上只有一句:于是得救。情节到此戛然而止,之后的内容都是插曲,而非情节的一部分。姐弟相认既是身份的发现,也是从厄运向好运的突转,同时还使得他们的获救成为可能或必然。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概述中,《伊》的主要情节是由悲剧人物的行动所构成的以下事件:第一,姐姐在异乡担任祭司,弟弟到来;第二,弟弟被捕,即将被姐姐献祭;第三,姐弟相认;第四,姐弟得救。事件相互间的衔接既不乏令人惊异之处,又符合可能性的原则,清晰的因果关联将悲剧情节所刻画的行为编织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那些与情节主体缺乏因果关联的事件,如弟弟前来的特殊目的、被捕的具体原因以及最后依赖于机械降神的得救方式,则构成了插曲,或处于戏剧主体情节之外^②。

五、伊菲革涅亚的性情与身份发现

《伊》中是否也存在着性情与行动之间的可能性关联?这种可能性是否因为行动者的身份和性情而具备某种道德哲学意义?这部剧并非以对人物性情的刻画而著称的悲剧,但它同样也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仅有行动而没有性情的悲剧。对于核心角色伊菲革涅亚的性情,欧里庇得斯进行了足够细致的刻画。伊菲革涅亚本应是那场在奥里斯的献祭中的牺牲,但却出人意料地作为一部戏剧的主角出场。她在异乡蛮族人中流亡多年,为过去所受的伤害深感痛苦,但并没有怨恨希腊人,也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或情感麻木。相反,她极富同情心,温和而悲悯,为被献祭的希腊人流泪。她是剧中最有智慧的人物,是她而不是两位男子临机应变谋划出逃亡的巧计。但伊菲革涅亚最核心的性情是她对亲人的爱。她因为与家人长期音讯隔绝、生死未卜而深感悲哀,她后悔在奥里斯的临别之际没能好好地拥抱尚且年幼的弟弟妹妹(行373—375)。在和两位被俘者对话之前,伊菲革涅亚自语道:你们的母亲是谁,你们的父亲是谁,你们的姐妹是谁?如果有的话,她将失去多么好的兄弟呀(行432—435)!对陌生人的同情正是自我境况的投射,是她本人对家人的强烈思念和关切。

亚里士多德称赞该剧中姐弟相认的方式是最好的发现方式,因为发现来自事件本身,震惊通过可能的事情而产生(1455a16-19)。应当如何理解这一可能性?当思乡心切的伊菲革涅亚得知两个希腊年轻人来自自己的家乡迈锡尼时,自然地提出请他们帮忙捎一封家书,告知失散多年的亲人自己还活着的消

① 此处的 οἰκεῖος 可以理解为“适宜”,也可以解释为“特殊的”。奥瑞斯特斯因发疯病而被俘以及神像必须在海水中清洗以净化的借口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参见 R. Janko, *Aristotle Poetics: With the Tractatus Coislinianus,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etics II,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Poet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p. 119。

② 贝尔菲奥里认为,在奥里斯发生的事件、伊菲革涅亚的女祭司身份、伊菲革涅亚和奥瑞斯特斯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使本剧情节成为可能或必然的条件,包括奥瑞斯特斯的到来和最终姐弟获救的好运气。但这些事件本身并非全部出于必然性或可能性,如弟弟的到来和最终的获救都出于偶然或者机械降神的外在原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情节概述中明确要求把这些要素置于情节之外。参见 E. Belfiore, “Aristotle and Iphigenia”, in A. O. Rorty ed., *Essays on Aristotle's Poetics*, pp. 373-374。

息。这在因果关系上合乎情理,同时也恰恰是伊菲革涅亚本人性情的自然结果:她要抓住机会让她最爱的人(弟弟奥瑞斯特斯)知道自己的处境,救自己逃离陶里克。可以说,正是伊菲革涅亚对亲人的爱促使她不断地追问并提出送信的要求。这还不保险,因为担心送信人遭遇意外而丢失信件,所以她决定告知送信人信中的内容,从而导致姐弟相认的惊喜。这一番选择和行动,正是伊菲革涅亚本人性情的最佳体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种震惊是通过可能的事情产生的,而这种可能性正体现出性情与行动之间的明确关联。

以可能性或必然性原则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伊》剧情的概述体现出悲剧情节的一体性。这一概述不设姓名,因此同时验证了诗的普遍性特征,但仍然保留了难以进一步化约的身份信息:姐姐和弟弟的亲缘关系。姐弟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全剧的焦点,其情节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神与人的双重姐弟关系:神中的弟弟阿波罗命令凡人的弟弟奥瑞斯特斯前往陶里克迎回自己姐姐阿尔忒弥斯的神像,结果奥瑞斯特斯遇到了自己本以为已被献祭的姐姐伊菲革涅亚。当风浪把他们逃走的船吹回岸边时,凡人姐姐伊菲革涅亚向神中的姐姐阿尔忒弥斯祈祷,最终点明了两组姐弟关系对本剧的重要性:勒托的女儿啊,既然你爱(φιλεῖς)你的弟弟,请相信,我也爱我的亲人(1401-2)。

这部悲剧的结局不再是亲人的彼此杀戮和家庭关系的破裂,而是血缘亲情的恢复,以至于该剧在何种意义上仍是悲剧成了疑问。这个家族原有的行事模式是通过弑亲而复仇,但此刻姐弟二人都愿意为了对方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行1001—1011)。与很多其他悲剧一样,该剧揭示了家庭这一人类文明基础遭受的严重威胁;但其特殊之处在于,诗人以姐弟相认的方式终结了家族血亲仇杀的循环。

综上所述,诗的普遍性并非超越人类存在的基本样式和基本情感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可能性要求恰恰落实于人类的家庭生活和血缘亲情之中。家庭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共同体,也是构成城邦公共生活的前提。毁灭亲人之爱的血亲仇杀威胁着人类幸福最深的根基,这正是其最能激发恐惧与怜悯的原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必然性、可能性与偶然这样的模态词并不仅仅适用于逻辑学、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推理和分析。正如人的行动也展现出合目的的自然性和规律性,悲剧的模仿也以符合可能性模态的方式呈现出人类生活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彰显了诗的哲学性价值,确保了悲剧情节结构的可理解性。同时,以人物性情为基础的行动选择以及角色之间的亲缘关系背景,又点明了悲剧情节内在的道德哲学意涵。

Aristotle on Modalities and the Unity of Tragic Plot

Dong Bo

Abstract: Aristotle proposes in his *Poetics* that the unity of tragic plot must be achieved b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odal terms to constrain the composition of tragic poets raises numerous questions. By examining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modal term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probability” is more suitable than “necessity” for describing the human actions imitated by traged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Aristotle’s recapitulation of the plot of *Iphigenia in Tauris*, the principle of probability requires,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tragic plot present the causal connections among events in human life,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poetry;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choice of action based on character reveals the inherent moral-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the tragic plot.

Keywords: Aristotle; necessity; probability; *Iphigenia in Tauris*

【责任编辑:全广秀;责任校对:全广秀,张慕华】